

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译丛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许宝强 袁 伟 选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另类视野:文化/社会研究译丛

编委成员

汪晖 宋伟杰 袁伟 许兆麟 孙歌
许宝强 陈顺馨 刘健芝 戴锦华 罗永生

编辑顾问

$T\chi^2 \xi^{22} \chi \Xi^0 \omega \varphi \chi$
 $P\sigma_1 \xi^{08} \sigma^{28} \tau S^2 \pi \chi^{00} \nu^2, \mathcal{M} \varphi^{27} \Phi^2 \omega \chi^{27} \beta^2 \chi^0 \sigma^{17} \chi^2, \beta S \Xi$
 $a \xi^2 \chi O \xi^{003} :$
 $\partial^2 \sigma^2 S^2 \rho \chi^2 \theta^{02} \nu^0 \xi^1, \beta^2 \chi^0 \sigma^{17} \chi^2 \tau \partial \xi^2 \varphi \chi^0 \nu^{832}, \beta S \Xi$
 $\Pi \varphi \sigma^2 \Omega^2 \xi^2 - \Phi^2 \chi^2 \nu$
 $a \varphi \sigma \Pi \tau^{88} \sigma \tau^{30} \Pi^{0088} \xi^0 S^2 \rho \chi^2 \xi^2 \rho$
 $a \varphi \sigma P\sigma_1 \xi^{08} \sigma^{28} \tau T^2 \sigma \chi \nu^2 \partial \xi^2 \nu^2 \xi \nu \sigma^2 \xi^2 \rho \partial \chi^0 \sigma^2 \xi^{89} \sigma^2,$
 $\partial \xi^2 \chi^2 \xi^2 a^2 \chi^2 \nu \Phi^2 \xi^2 \beta^2 \chi^0 \sigma^{17} \chi^2, a \xi^2 \chi^2 \xi^2$
 $\epsilon^{883} \mathcal{X} \varphi \chi^2 :$
 $\theta \xi^2 \chi^2 \chi^2 \Xi \chi^2 \rho \sigma^{28} \sigma^2 \Pi \tau^{288} \sigma, a^2 \omega^2, \mathcal{M}^2 \xi^2$
 $\epsilon^{22} \varphi \xi^2 \omega \chi \Omega \chi^2 \varphi \chi \rho \sigma$
 $T \xi^2 \pi^{008} \tau \mathcal{X}^2 \sigma^2 \xi^2 \chi^2 \xi^2 S^2 \rho \chi^2, \epsilon \sigma \chi \chi T \xi^2 \omega \chi^2 \beta^2 \chi^0 \sigma^{17} \chi^2,$
 $\xi^2 \omega \varphi \xi^2 \xi^2 \mathcal{M}^2 \xi^2 :$
 $\epsilon \sigma \xi^2 \nu \varphi \xi^2 \epsilon^{200} \chi$
 $T \sigma^{00} : \tau^2 \varphi \sigma \Xi^{0780} \xi^2 \chi^2 \Xi \pi \xi^2 \rho \sigma^2 : \tau^2 \varphi \sigma \Phi^2 \xi^2 \chi^2 \chi^2$
 $\Xi \varphi \chi^2 \partial \xi^2 \rho^2$
 $P \chi^2 \sigma \sigma^{30}, \Pi \tau^{88} \sigma \tau^{30} \varphi \sigma S^2 \rho^2 \tau P \sigma^2 \sigma^2 \chi^2 \nu S^2 \pi \chi^2 \chi^2,$
 $\partial \sigma^2, P \sigma \varphi \chi, \mathcal{X}^2 \rho \chi^2$
 $S^2 \varphi \sigma^2 \theta^{02} \xi^2 \xi^{88} \sigma^2$
 $T \xi^2 \pi^{008} \tau \Sigma \tau^{22} \chi^2, \Pi \varphi^{00} \xi^{032} \nu \omega^{82} \beta^2 \chi^0 \sigma^{17} \chi^2, a \varphi \xi^2 \chi^2 \xi^2 \rho$
 $S \varphi \sigma^{00} S \chi^2 : \tau^2$
 $T^0 \sigma^2 \pi \varphi P \sigma_1 \xi^{08} \sigma^{28} \xi^2 \rho \Phi^2 \xi^2 \chi^2 \chi^2 P \sigma \pi^{00} \xi^2 \theta^{02} \nu^0 \xi^1$
 $\Pi \tau^2 \pi^0 \rho \chi^2 \beta^2 \chi^0 \sigma^{17} \chi^2, \Pi \xi^2 \xi^2 \rho \xi^2$
 $a \sigma \chi^2 : \chi^2 \chi^2 \partial \chi^2 \xi^2 \phi \xi^2 \xi^2$
 $\Pi \tau^{288} \sigma \tau^{30} \varphi \sigma S^2 \rho^2 \tau \Pi^{0088} \sigma \xi^2 \rho S^2 \pi \chi^2 \sigma^2, O \xi^2 \nu \xi^{00} \sigma^2 \mathcal{X}^2 \rho \chi^2$
 $X^2 \xi^2 \sigma^2 \partial \xi^{00} \sigma^{18} \sigma \chi^2$
 $T \sigma^2 \xi^2 \rho O^2 \xi^2 \rho \sigma^2 \Pi \tau^{288} \sigma \xi^2 \rho P \sigma_1 \xi^{08} \sigma^{28} \tau S^2 \pi \chi^{00} \nu^2,$
 $S \beta \partial \xi^2 - O \chi^2 \nu \varphi \xi^2 \xi^2, \beta S \Xi$

前 言

◆ 孙 歌

有关语言与翻译的政治,是我们大陆学人思考中的一个盲点。这个盲点并非来自知识的不足,而是来自实感的缺乏——当不具备自身紧迫的问题意识时,知识永远是身外之物。或许,如何阅读这本译自西文的论文集,倒是对于我们自身的问题意识构成了一个考验。在这本以理论形态呈现的论文集面前,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理论性阅读”。假如我们不具有切肤的问题,那么这本译文集也不过是不断累积着的西方知识库存中的又一个无关痛痒的知识点而已。

被翻译过来的这本讨论语言和翻译的论文集,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在“他们”与“我们”之间,所有人为了“东西方”鸿沟都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以及对于权力关系的解构中暴露了它的虚构性和遮蔽性。正如本书中惟一的一位大陆出身的在美学者刘禾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中介,这就使我们不可能自称拥有一个物化的过去。”“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的是,在历史偶然性的关键时刻,西方和中国过去的思想资源究竟是怎样被引用、翻译、挪用和占有的,从而使被称为变化的事物得以产生。”(本书第249页)

或许这也是对于我们当下知识情境的一种描述。在又一次面对翻译的高潮,面对西方思想资源被引用、挪用和占有的时候,我

们或许也正在面对近代中国知识人曾经面对过的那一“历史偶然性的关键时刻”。在这里面,不仅仅传统与西方这一问题预设缺少问题性,而且,对于这一问题预设虚假性的揭示本身也隐藏着虚假性的陷阱:当思考不再能够以否定一方来确立对立的另一方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同时抵御来自文化本位主义的思考惰性和所谓“全球化”世界描述对地域性紧张关系的遮蔽性,更何况,我们又不可能摆脱在打破这两种思考格局的同时利用它们造成的某种思维定势建构新问题的宿命。于是,这无可摆脱的张力就形成了多重的张力场,于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就分外复杂: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它对于今天中国大陆的学人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与其他问题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来说,它能否带来新的刺激和生长点?许许多多的“中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哪个层面上介入了我们的思考,重塑着我们的现实感觉?

—

本书的翻译从福柯开始。这似乎构成一个隐喻,为解读有关当代话语和翻译的政治确定了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被质疑的起点——很少有人像福柯那样一针见血地指出“起点”的不可靠和诱惑性:“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规避开端的欲望,以求从最初即在话语的另一边,这样便无需从外部考虑话语的奇特、可怖和邪恶之处。体制之于这一常有愿望的答复却是讽刺性的,因为它将开端神圣化,用关注和静默将其围绕,并强加仪式化的形式于其上,似乎是为了使其在远处亦能更为容易地辨认。”(本书第2页)

在福柯日益被东方知识分子符号化为一个不可质疑的“起点”的时候,倾听福柯本人的这种提示就不可能仅仅意味着对于福柯谱系学的理论阐释;至少不无讽刺的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这段话里

联想到福柯本人在东方是如何被神圣化并且被强加以仪式化的形式的：似乎引用福柯变成了一种标签和通行证，它使得引用者获得了某种在远处容易辨认的“起点”。但是，在此我没有余地讨论福柯在东方知识界的偶像化过程，更迫切的问题是，在这部论文集的阅读中，福柯这篇论文在排列上所构成的这个“开端”，是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与他的谱系学相似的充满“断裂”和“异质性”以及“偶然性”的思考基点？

福柯在这篇短文里以浓缩的方式提出了他在几部主要著作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话语权力和话语霸权的体现方式、控制话语的程序、作者功能的阐释等等熟悉命题的再度揭示；可以从他对真理意志的质疑中获得极具现实性的启示；但使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他对于“话语实在性”或曰“话语事件”的阐释：在本文乃至本论文集中，它获得了一种不断释放的能量，使得我们不能不把习惯的思路稍加收敛，以图“沿着初看是悖论性的非物质性的物质主义方向前进”。

福柯论述到：西方思想似乎警惕着只让话语在思想和语言之间占据尽可能小的空间，使得它变成了透明的沟通桥梁而不具有自身的实体性；而福柯则强调话语的具体实在性，从中引出两个相互关联但很少为哲学家们在哲学规范中加以定位的概念：事件和断裂性。

“事件不是实体亦不是偶然，不是质量亦不是过程；事件不属于有形的物体范畴。但它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它总是在物质的层面产生功效，成为结果；它有自己的处所，位于物质因素的关系、共存、弥散、交叉、积累和选择之中。它不是实体的行动或属性；它是作为物质弥散的结果而产生，且在物质弥散桩中。”

“如果话语事件必须被按照同质但遮彼此关系上又断裂的系列来处理，那么我们将给这种断裂以什么样的地位呢？当然这不

是吮间上的瞬间连续性问题,也不涉及不同思维主体的多元性。这是一个关乎打破瞬间并把主湾散布于多种可能的位置和功能之中的那些停顿($\pi\acute{\xi}\sigma\tau\eta\sigma\iota\varsigma$)的问题。此种断裂敲击并取消排些传统上被承认且最难加以质疑的最小单位:瞬间和主体。”(本书第22—23页)

福柯在别处论述“由来”概念被用于分析人种和社会形态时的谱系学意义的时候强调过:“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之下的各种各样的痕迹,交错于个别之中、亦足以构成难以拆解的网结的痕迹——确认所有这一切才是问题所在。这种起源,与相似关系的一个范畴完全不同,它整理相异的所有痕迹,使得它们有可能区分为完全不同的东西。”^[1]

在对起源的传统式兴趣中,通常隐藏着的欲望是归结相似关系和揭示这种关系在历史脉络中的连续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揭示了这种欲望本身的历史性特征,即它亦是建构起来的从而隐藏着知识权力关系;而福柯的兴趣其实更在于提供一套“不在真理之中”的新的概念工具和新的理论基础,因为它不在真理之中,所以它也谈不上是谬误,然而它却容易为真理或谬误所回收。

最容易被回收的就是福柯这种谱系学所导致的问题意识:它是否是“反历史的”成为了一个问题。其实只要我们如此发问,我们就远离了福柯:福柯用“考古学”或“谱系学”为历史重新命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通过“断裂”敲击并取消瞬间和主体的时候,福柯同时开启了一个使瞬间从固定时态中解放出来的缝隙,使得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充满了纷纭和不确定的“痕迹之网”,这就是福柯意义上的历史,它通过断裂的缝隙使过去、现在、将来发生了关系,拆解了线性的时间秩序:“当历史在我们的存在自身中导入非连续性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实际的东西’;实际的历史分割着我们的诸种感情;把我们的诸种本能型塑为活剧;使得我们的肉体

多样化,并使得肉体与肉体自身相对立;具有安定性的、给予我们有关生或者自然的那种安心感的一切,都不能够存在于我们之下。”〔2〕福柯的历史感觉,就存活于这种没有起源没有坐标的无数被遗失了的事件之中,历史因而就不再仅仅意味着过去,它具有穿透力地指向了将来。只有拥有了这种与其说接近哲学,不如说更接近医学的历史感觉,话语的不透明性才会呈现。

福柯是一个使用结构主义策略的解构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反结构的结构主义者。但是这种他本人所反感的定位只有与他上述基本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意义——诚如福柯所言,抽象讨论“结构主义”之类的问题不会引出任何问题。在此我们不能不追问的问题是,福柯为什么要使用断裂来敲击主体与瞬间,这与他所强调的“痕迹”和“相异性”究竟有什么关系?

在福柯的知识谱系学里,“历史”不是由连续性的确定事件构成,而是由不确定的,如同船只驶过水面之后那种波纹般的“痕迹”组成。尽管福柯使用了结构主义式的二元对立模式为自己的论述确定了明确的对立面,但是他关注的这种痕迹和断裂却使得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结构主义者:他彻底地解构了结构主义给我们的那种安心感。而“主体”和“瞬间”就在这种安心感的瓦解之下被敲击,从而变成了“实际的东西”。

福柯指出,由于断裂被赋予了话语事件“连接体”的意义,主体就被散布于多种可能的位置,于是,那个所谓不同思维主体多元共存的预设就被打破了。当主体不能再充当传统意义上的最小单位时,我们面对的问题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追究的不再是能否建立主体性的问题,也就是不再追究是否建立了主体性以及此主体与彼主体的共存关系问题,而是追究作为主体的自我被建构过程,以及看似矛盾的主体存在方式所包含的多层次内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福柯强迫我们面对不确定的差异关系时,我们便

面对了主体的非整合性开放状态从而面对了话语与翻译的政治。

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如同翻译话语那样更能够体现主体性的这种内在的‘断裂’。在大量的话语实践中,翻译话语的‘主体’所面临的是最不安全的处境。对于主体,它意味着对于自我整合性的否定,意味着进入陌生的区域使得主体失掉这种整合性而发生‘弥散’。在‘主体’不再能够自足的时候,“他者”也不再能够自足,而主体与他者的这种同时发生的弥散和聚合,就以话语事件的非物质性为自己的存在空间;它为这弥散提供了场所。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称话语事件‘总是在物质的层面产生功效’。发生在话语事件中的,正是主体对于绝对自我认同的质疑,于是,那些由于自我认同而被舍弃的所谓‘个别性’和‘偶然性’的事件,便突然获得了它们的意义。

福柯并没有正面讨论翻译的政治,但是他对于主体性断裂的论述却暗示了一个进入翻译政治的基本途径。主体在什么情境之下才是“实际的东西”?这是福柯向我们提出的问题。这里的麻烦在于,我们并不能以传统的作为最小单位的‘主体’概念去面对福柯的提问(我相信,这正是福柯易于被误读的关键所在),主体必须在被敲击和断裂之后才能进入福柯的问题。也就是说,发生了弥散的自我与他者的再次组合,已经不能够简单回归原来那种具有整合性的自我了,新的自我具有多种可能的功能和定位,它因而不得不自我开放,冒着不再是自我的危险。在本书所收的斯皮瓦克的论文中,这种危险得到了更充分的论述;结合对于福柯的阅读,或许更容易理解斯皮瓦克为什么要把‘他者’更名为‘她者’。假如我们把他者作为与传统意义上的主体相对应的最小单位,那么,弥散就不会发生,断裂和痕迹就失掉了它们的‘分割’功能,历史就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工具,而翻译的政治性,就被整合进了对于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建构过程中,它所可能发生的对于主体的‘敲击’功能,

也由于这种整合而丧失殆尽。反过来,这时话语与翻译的政治性,就体现为它们对于那个作为“最小单位”的主体的认同与共谋,通常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放弃福柯所强调的那种“作为物质弥散结果”的作用,不以自己的文化功能促使主体散布于多种功能之中。

但是,福柯对于主体性的取消绝对不意味着他对于主体性的否定。假如把这个问题放在福柯的“非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论述方式”中思考,可以看到福柯其实一直在追究主体可能具有的“实际样态”,他反对的是整合性的形而上学主体,却不是体现在谱系学里的历史性主体。就后者而言,断裂、弥散、差异和不确定构成了主体可能存有的形态,但是它们本身足够扰乱我们对于主体的固定感觉从而使人感到主体无法存在。或许只有进入实践层面,只有面对所谓的“文化冲突”和翻译的种种困境,福柯在理论上很难进行到底的这种对于主体的论述才能呈现它的价值。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达、斯皮瓦克这样的解构主义者的理论武器更有效地显示了主体性追求过程中的两难之境。在本书福柯与斯皮瓦克的论文之间,是否可以整理出有关主体性建构问题的内在关联,或许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至少在思考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理论的生产性功能时,福柯与斯皮瓦克表面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提醒我们,避免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曲解围绕着主体性问题形成的上述理论探讨,谨慎地对待诸如“断裂”、“差异”、“偶然”和“痕迹”等等概念,可以有效地避开那些把旧理论贴上新标签的可怕陷阱。

在本书的隐喻之中,话语和翻译的政治由于福柯文本的这种他本人最不情愿的“开端”位置获得了“你得继续,我不能继续,你得继续,我将继续”的特征。尤其是当这种讨论必须首先透过翻译本身——而翻译得依靠话语的修辞功能,如斯皮瓦克所言,修辞一旦被收编,它的功能就被破坏殆尽——进行的时候,福柯最大限度

地提醒了我们脚下这块基石的不可靠。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追问一个问题:在轻松地进入这本译文集的阅读之时,我们正在被什么样的‘真理意志’所支配?而福柯以他的话语秩序理论向我们要求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概念工具和新的理论基础’?那些难以被约定俗成的真理或者谬误所回收的知识遗产和批判武器,在当今社会的话语实践中,究竟是否能够生根?

二

使我对福柯发生兴趣的,其实是一个并不属于福柯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点上,作为‘东方’知识分子,我们为什么要谈论话语和翻译的政治?

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为今天人人都在谈论‘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副作用。不过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对于霸权理论的知识今天正和各种形态的霸权意识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其实‘西方文化霸权’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来自‘西方’已经是一个疑问,更何况在东方这个虚拟的时空中,‘西方’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拟的话语。当‘东方’与‘西方’日益变成一种符号的时候,所谓‘西方文化霸权’体现的往往是东方文化自身的等级结构。在此意义上,翻译的政治首先并非来自‘外部’对‘内部’的入侵,它来自本土知识精英权力乃至利益的分配关系,来自知识精英与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纠葛。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掉被日益定格化的‘霸权’政治之外,那些被我们所忽略、却渗透于社会生活本身的潜移默化的‘政治’往往被知识的面貌所遮蔽,特别是当它以话语的形态呈现的时候。而这一切,恰恰是福柯所关注的那种‘微妙的、独特的、隐藏于个别之下的各种各样的痕迹’,它们以非政治的姿态或者惊人的政治无知性显示着

“话语的秩序”，这秩序本身就是政治的痕迹。

话语的秩序首先体现为翻译的现状。中国大陆的翻译状况一直是令人不满的，不仅翻译的水平参差不齐，译者队伍素质不高，而且在选题与构想方面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但是，这些令人不满的基本状况是可以弥补的，而且近年来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弥补；所以我认为这并非是翻译现状的核心问题。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一切背后活动着的那个系统，那个以中国大陆的外语教育体系为基础的外语教育和翻译的理念，那个把语言视为传达思想的工具的古老传说。正是这一切，在把话语透明化的同时，不露痕迹地抹掉了话语和翻译的政治性。

有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可以象征中国大陆的外语教学，那就是同声翻译的训练。一个掌握了双语的翻译要接受同声翻译的训练，要点是把自己“清空”。据说经过是这样的：首先，接受训练者要经过一段“鹦鹉学舌”的过程，就是通过耳机不断接收母语信息，再以最快的速度不断把它用母语传达出来。这是同步传达，同步而不翻译。当他习惯了这种程序之后，在事实上自我意识已经被“清空”，他变成了一个传声筒。接下来，耳机开始传达外语的语词信息，接收者用母语把它表达出来，接收者的要点是迅速对译关键词。反过来，接收母语表达外语也是同样的要点。我有几位很优秀的同传朋友，据他们介绍，其实他们翻译过的大部分内容他们不甚了解，也不需要了解，甚至有时一场翻译下来，他们几乎不记得自己究竟听过和说过什么。除掉那些他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之外，公事公办的翻译不需要使用头脑。

也许这种表述有些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尤其对于没有接受过这类训练的人的来说，这不啻于天方夜谭。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传达那些不进入自己的理解程序的话语时是何种感受，因为作为每天使用语词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与理解脱节的识别，也没有

办法理解与内容脱节的‘形式’。但是千真万确，假如同传翻译尝试理解，他就很难工作了。

然而同传训练中却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真实，它指示着翻译的政治所处的隐蔽位置：当意义可以通过识别加以传达的时候，意义的政治性就有可能被最大限度地遮盖起来，于是传达变得安全和很少被质疑。识别，就这样成为了意义的同谋，或者反过来，成为意义的暗杀者。

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外语教学中，语法和语音训练依然构成教学的基本骨架。正如本书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文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教学教会学生的是‘识别’而不是‘理解’。被识别的是‘信号’而不是‘符号’，“在任何情况下，信号都不会与意识形态领域发生联系，它属于技术手段的世界，与广义的生产工具有关。”（本书第59页）“如果我们把同意意识形态内涵割裂开来的语言形式加以物化（*οὐσία*），就如同第二种思潮的某些代表人物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最终面对的就不是语言—言语符号，而是信号本身。”（本书第61页）

我亦有些大学本科毕业于外语院校的学生，他们传达给我的苦恼就与这种‘识别式教育’直接相关。当他们在我的课上不得不面对符号而不是信号，面对福柯所说的那种被西方思想所警惕着的、带有实体性的‘话语事件’的时候，这违背了他们的学习习惯。假如放弃识别信号而转向理解符号，这就意味着对他们大学四年里所受教育的颠覆。

然而这些例子还只不过是例子而已。外语教育作为一种体制，它不断再生产着的这个识别信号的过程，包含了一整套不可动摇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不仅把话语视为透明的载体，而且确信两种语言的话语之间是可以对译的。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直译”的盛行。符号的可变性与可塑性，在一个变化流动的语境中话语

的流动性与创造性,都被规范一致性所取代。而在一对一的语词转换过程中,话语不再有可能面对它自身:它的实体性越稀薄,它才越可靠。正是在这样一个翻译思想的操纵之下,可以对译的准则也就转换为译者最大限度的安全系数:译者在“清空”了自身的同时,也“清空”了不对等的两种话语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还进而“清空”了一种话语内部的复杂张力关系。正如语法构成语言教学的骨架一样,逻辑构成了翻译的支柱。译者可以堂而皇之地丢失掉很多东西,那是在逻辑的周围构成了解构逻辑的“特殊修辞”,只要它不能“对译”为另一种语言,它的丢失就是合法的。

国内翻译界经常发生有关翻译的争论,在我的阅读范围内,这些争论从来没有超出过“识别信号”的层次而进入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要言之,有关翻译的争论总是围绕翻译的准确性而展开,被举出来的不准确翻译的例子,也总是那种着实低劣的译文。并不是说这些争论没有意义,至少在技术层面,我们需要揭露那些滥竽充数的翻译以确保“意译”不会变成“乱译”;不过这种争论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从来不去追问一个根本性问题:什么才是好的翻译?

其实,有关好翻译的标准早就语焉不详地被人们接受了,那就是严复本人也不曾遵守过的“信、达、雅”(对于严复本人的翻译实践,我觉得应该进行更慎重和周密的讨论,在此只能从略;但本文最后一节将要提到,严复在信和达雅之间有着复杂的摇摆,不能简单忽略)。我并不想在此对这个标准进行挑战,毕竟在前辈翻译大师的译作中,我们能够找到足够诠释“信、达、雅”含义的例证——而且它们总是让我们感觉到某种面对复杂时的愉快。可是恰恰是这一翻译标准,最大限度地抹掉了话语与翻译的政治性,遮盖了它们本身作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紧张度,把对翻译这一行为的理解引向了教养与知识。事实上,“信、达、雅”标准不能孤立于时代的

文化政治关系之外去定位,仅仅从字面上,我们无法看到它隐含的复杂历史内容。

然而,假如在现行的外语教育体系当中为“信、达、雅”的基准定位,就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置换:在以语法语音和词汇要素为基本教育框架的学术训练(沃洛希洛夫称这种源自欧洲的语言学思想是“在对书面语言尸体的关注上形成和成熟起来的”)之中,这个曾经被老一辈翻译家实践过的复杂标准,不得而被最大限度地简化乃至抽空——它赖以存在的关注两种语言各自的张力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张力关系的能力,如今已经被简化为语词的置换与选择,在此基础上成形的“外国研究”,完全无法找到自己的立场。我在此要说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所处的极为复杂的文化位置,本来应该具有单语文化视角所不具备的思想生产能力,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双语教学与研究所凭借的立场,仅仅是对母语文化立场(甚至仅仅是意识形态立场)或者是另一种文化立场的简单复制,而不言而喻,这两种复制不仅不具有原创性,甚至就复制本身而言,它也往往有鹦鹉学舌的拙劣之嫌。由此,我们遇到了困扰着福柯的主体性问题:假如主体无法处于弥散状态,它就无法处理所谓的主体之间多元化问题,具有整合性的主体与所谓“他者”之间的关系,至多不过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和平共处,其直接效应就是遮蔽主体存在的真实状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比起本土研究来,我们的外国研究离文化冲突更远,更难于处理两种文化边缘处的复杂张力问题。

现今的外语教育和与其直接相关的翻译体系,就这样在被“清空”的状态下至少面对一个尖锐的问题,那就是“我在何处?”尤其是当译者不甘于仅仅做传声筒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变得尤其尖锐。在外语教学中被用做教材的原文文本,也因而变得身份可疑——它们要么变成课堂上至高无上的权威,要么变成遥远而陌生的他

人的领地；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学习者都不能找到自己正当的位置。当今外语教学最易培养两种类型的学者：要么是毫无头脑鹦鹉学舌的文化买办，要么是极端而简单的民族主义者，就是因为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何处？”如果进一步追问下去的话，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能否放弃主体的整合性去面对主体开放的弥散状态”？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外语和翻译的现状远远不能够被问题化。话语和翻译的政治，并不能够真正成为我们切身的问题。我想再一次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我们思考中的这个盲点并非来自知识的不足，而是来自实感的缺乏。而为什么在我们的话语世界里，有关话语和翻译的政治问题，不能作为实感真正建立？

思考这个问题需要回顾的不仅仅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翻译史。翻译在文化格局中的定位服从的是文化政治的逻辑，这一逻辑植根于对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的设计。当“越界”对于主体的冲击被简化成“自我”与“他者”（我们最习以为常的就是“他山之石”的思路）的并存关系时，翻译的政治无法获得自身的定位，只能成为主体自足性的同谋，从而使主体感到安全。外语教育的思维方式正服从于这样一个使文化主体保持安全感的前提，由此才使得“同传式外语教育”成为其主导教育方式。当被清空的状态成为翻译的佳境的时候，当外语教育把识别信号当成第一目标的时候，抹煞翻译政治性、稀释话语实体性的操作过程就被悄然合法化了。话语与翻译似乎天然地与意识形态领域不搭界，它们仅仅成为技术性的手段。这正应了福柯的说法：“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持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其所传递的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本书第17页）以非政治的方式，外语教育体现了它的政治性；通过“清空”，受教育者成为思想和语词之间尽可能透明的桥梁，成为出色的“传声筒”，一个受制于不同文化又跨越不同文化，因而可能具有最大

思想生产能力的领域,就这样被有效地消解掉了。

三

我想再回到不确定的起点上,重新思考话语和翻译的政治。在此,我希望援引斯皮瓦克的例子。

斯皮瓦克在《翻译的政治》中提出了语言的‘三面结构’这一概念,即修辞、逻辑、静默构成了语言的三重性或三面结构。但是,这一结构不具有任何静止的状态,它呈现为这三重要素之间的流动性而且往往是破坏性的互动关系:

“在能动者的产生过程中,修辞会破坏逻辑,从而显现从内部激发着修辞产生的静默(ἡσυχία)的暴力。逻辑使我们得以依据明确标明的连接把言词串联起来,而修辞则必须在言词之间及言词周围的静默中活动,试探着怎样才起作用,效力有多大。”(本书第279页)

斯皮瓦克并且指出,假如无视上述这一结构的存在并且不在作为翻译对象的另一种语言中建构起这样的模式来,翻译工作就会变得易如反掌。

这种易如反掌的翻译在我们的周围见得太多了,只不过由于外语教育的定位问题,我们习惯于把译者的轻率看成是“技术性”的原因,而很少从斯皮瓦克的角度去考虑,翻译媒介的风险和暴力有什么政治含义?在三面结构之中,译者的两难之境是什么?当斯皮瓦克试图传达她的这种“冒险”感觉的时候,我感到接近了翻译本身的越境真实。

斯皮瓦克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那就是“如织好的布匹一般的语言的织边在松脱、散落成轨道”。这是一个只有逼视翻译的越境真实并为这种逼视所苦的人才会提出或了解的比喻。当语

言的织边松脱时，被破坏了的是已然排就的话语次序和思维程序，还有潜在于其后的政治暴力——来自不同语种之间的等级次序，或者来自同一语言结构内部的话语霸权。而问题在于，这种织边的散落也倚仗着另一种暴力，斯皮瓦克把它描述为潜藏于话语逻辑周围的“静默”。当修辞借助于静默的暴力破坏已然排就的话语秩序时，另一种“轨道”也在悄然形成，尽管它未必意味着新的秩序和结构，但是它却把读者（译者）的理解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赋予读者（译者）以一种新的理解可能性。

福柯不无讥讽地说：“让那些词汇贫乏之人说——如果他们发现此一术语更为方便，而不是更有意义的话——这一切都是结构主义。”（本书第27—28页）而斯皮瓦克对于织边的描述也使我感到了词汇贫乏，尽管我不想说“这一切都是解构主义”！

然而即使词汇贫乏，我依然不得不追问斯皮瓦克的问题：在织边散落的过程中，她以自己的“爱意”体会到的，是什么样的越境真实？

斯皮瓦克是在女性书写的前提下讨论翻译的，这样的预设不但没有使她缩小讨论的范围，相反，她比福柯更接近了翻译的政治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而把翻译的问题推向了更为广阔的视域。当斯皮瓦克说她把德维的书写视为“印度妇女”的写作感到不安时，她不仅把女性主义的范畴与种族的立场和地域政治的立场区别开来，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大胆的“播散性”的视域：她比福柯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播散是无法控制的：所谓反本质主义的文化立场，只有在这种情境下才是真实的。因此可以了解，为什么在文章开头处斯皮瓦克说要把超出想像能力的“他者”冠以“女人”之名——在女性视野之中，所谓“他者”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与那种“共同一致性”的假设针锋相对。让我们在此记起福柯对于主体性的刻意消解；在斯皮瓦克这里，“他者”被“共同一致性”消蚀了其反本质